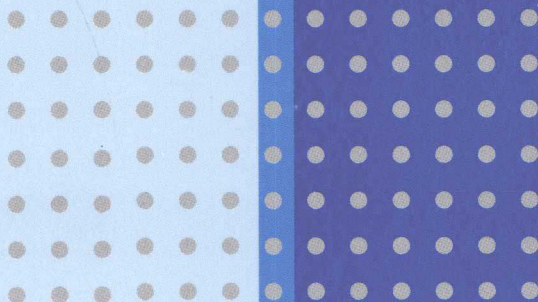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 理论与实践续编

A Sequel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梁景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 理论与实践续编

A Sequel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th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主办

梁景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 / 梁景和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097 - 7626 - 1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文化史 - 中国 - 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859 号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

主 编 / 梁景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3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626 - 1

定 价 / 9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编委会（姓名以汉语拼音为序）：

顾 问：齐世荣

主 任：郝春文

委 员：金寿福 刘 城 李华瑞 梁景和 刘乐贤
梁占军 史桂芳 宋 杰 徐 蓝 郝志群
袁广阔 晏绍祥 张金龙 赵亚夫

炽盛与深化——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 五年历程（2010—2014） （代序）

梁景和

中国社会文化史有广义与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与国内的历史人类学、新史学、新社会史、医疗卫生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有着紧密的交互和关联。而狭义的社会文化史更多指向那些公开以“社会文化史”为名号的学术研究。本文的旨趣主要在狭义的社会文化史，但也会涉及一些广义的社会文化史。

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书对中国大陆1988年以来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主要是对22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理论探索、研究基地、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和论述。^①本书全面搜集和整理了22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研究论文、主要专著的书评书序、重要会议的纪要综述和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学界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生学科，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创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②。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汇集了二十多年来十几位学者有关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发展的文章，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从创生、奠基到探索、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总

①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代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② 王建朗：《2009—201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结,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已走过初创阶段而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①。还有学者认为,“本书相当集中地展示了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为广大青年学者接触、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入门性的工具”^②。

2010年5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2010年4月28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的召开^③、2010年8月17日《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在《光明日报》的发表,2010年这一系列社会文化史重要事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从创生奠基阶段进入到了新的成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走过了五年,回顾五年的学术历程,可谓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炽盛和深化的大发展时期。

一 高频度的学术活动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交流密度的频繁,即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的频频召开。

(1) 2010年9月、2012年9月、2014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中国的学者共襄盛举,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进展,并促进有志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努力,辛勤耕耘,创造佳绩。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了清末民国的妇女、婚姻、家庭和家族问题;共和国的妇女、婚姻问题等。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女性再认识、文化史反思、区域社会生活等问题。有关前两届的会议信息可参见会议综述,^④并已经出版了前两届的会

① 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② 余华林:《一本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入门书》,《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1日第10版。

③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载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443页。

④ 吕文浩:《〈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王栋亮:《〈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94~301页。

议论文集。^① 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以及婚姻、恋爱、性别、性伦、礼俗、医疗、卫生、教育与司法等问题。^② 三次会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2011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太原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③。会议重点讨论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视角下的近现代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新领域的拓展等重要问题。^④

（3）2013年8月在湖北襄阳举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湖北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社会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大会提交论文70余篇，提交的论文大部分是以社会文化作为研究视点，“本届大会不仅为中外学者提供了增进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而且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⑤。

（4）2013年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深入和反思、文化史研究的再认识、女性研究的新视野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与交流。^⑥

（5）2011年3月、2012年3月、2013年3月、2014年3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二十世纪婚姻·

① 梁景和主编《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梁景和主编《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② 参见武婵《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未刊稿。

③ 杜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338页。

④ 参见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⑤ 参见李俊领《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社会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7期。

⑥ 参见徐晨光《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史学刊》2014年第1辑。



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就社会文化史的具体领域即婚姻、家庭、性别、性伦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

二 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近年的研究成果，可谓研究维度宽广多样，科研成果精湛丰厚。有一些专门文章对近年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做了全方位的评介，其中的两篇文章分量较重。其一是李长莉、毕苑、李俊领撰写的《2009—2011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①，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介绍了 2009 年至 2011 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的研究状况，包括社会与文化史理论探索；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文化制度、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宗教与民众信仰；历史记忆与建构等。其二是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撰写的《2011—2012 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②，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介绍了 2011 年至 2012 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的研究状况，包括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索；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社会生活、女性与法律；教育与宗教信仰；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等。这两篇文章对几年来出版和发表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做了全面的评述，有助于读者对学术现状的把握、认识、理解和思考。下面对一部分研究成果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1) 梁景和著《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该书探讨了“五四”时期的婚姻、家庭、女性、性伦问题，并专门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在此作者不是仅仅在做单纯的文献解读，而是把论题引向深入，既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又对它在近代中国的源流演变予以揭示，归纳总结了五项基本内涵：①“个性主义”的自由平等和自主之权。②“个性主义”的个人独立思想。③“个性主义”的享受幸福、满足欲望的人生观。④“个性主义”的社会责任感。⑤“个性主义”并非一些人眼中的绝对自由、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和为我主义。^③ 有人撰文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

① 李长莉、毕苑、李俊领《2009—2011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 年第 4 期。

② 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 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 年第 2 期。

③ 梁景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 158～161 页。

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 = 个性主义 = 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最后，作者给出了自己对‘个性主义’的定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一方面每个人对自身要有上述权利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人所具有的上述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辩证地指出了个性主义与社会进步的紧密关系。”^①

（2）刘永华主编的《社会文化史读本》。该书“编后记”指出：“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差不多都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当然，社会文化史还应拓宽自身的‘领地’，因此，对其他各种主题的探讨（详见第五编引言），亦应纳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日程。为便于读者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进展，编者特地编辑了‘延伸阅读’论著目录，并做了简要的批注。……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反映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和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时期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些区域和时段才是社会文化史分析的有效研究范围，而是大体反映了目前研究界的现状。同时，笔者也试图兼顾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不过，不少从事社会史、文化史或统称为新史学研究的学者的成果，都没能选入本书。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若干论著在推动中国史学的进展上正在发挥重要的影响——而是说他们的研究路数与本书提出的选编标准不甚相符。要是选入他们的论著，一方面不尽符合

^① 张弛：《社会生活与观念意识互动的新视野——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本书的主题，另一方面，编者也担心这样多少有扭曲他们的研究意趣之嫌疑。”^①

(3) 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王笛对于茶馆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在撰写《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过程中，萌生了就茶馆写一本专著的念头。《茶馆》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研究茶馆，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城市的内部，它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把茶馆视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入。“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会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所以《茶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茶馆的关注和研究，它更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其主旨是要探索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正如作者所说：“我希望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国家(state)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茶馆》是一部微观史，是一部叙事史，也是一部大众文化史。《茶馆》所反映的学术取向和价值，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4) 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这套论丛出版的宗旨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部分学者的研究论文发表出来，以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希望其中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套论丛从2011年以来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了4本。一是杨才林的《民国社会教育研究》(2011)，该书认为，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形式，对个体实现社会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民国时期(1912—1949)，80%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愚、穷、弱、私”是通病，外国人耻笑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当时的新式学校教育又存在四大弊病：制度照搬西方；受教育者大多只为做官；内容不实用，毕业即失业；对乡村增益少。为了培养“新民”，为了“唤起民众”，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和社会团体推进社会教育三十多年。其间开创了哪些事业？

^①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527~528页。

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成效如何？该书一一做了解答。二是黄东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2013），该书对抗战时期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统治的“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探索。该书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三是梁景和等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2013），该书选取1919年至1949年间，中国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娱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切入点，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从而深入认识、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也有助于今天人们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四是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2014），该书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17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婚礼仪式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该地区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

（5）罗检秋著《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1895—19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清末民初政治鼎革，文化剧变，人伦礼俗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该书系统地梳理了近代精英思想与礼俗变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从孝道、贞节观念和社会礼俗等层面，多角度地研究了五四新观念的确立、社会传播及其局限；另一方面，以此时期主要文化娱乐为个案，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考察了清末民初的京剧繁荣、商业化和坤角走红现象，并分析了“剧以载道”的思想转变。该书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报刊材料，关注当时的新闻报道，舆论热点和社会调查，并结合时人文集、笔记、日记、回忆录、游记等文献，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替和互动，认为文化与文化的创造者不能完全等同，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并非都属社会精英，历代下层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为精英文化的形成添砖加瓦；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同异互见，两者既有差异性，有些内容又不能决然两分，精英文化蕴含了大众文化，反之亦然；不同文化的转化和互缘，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一时期畛域分明，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其属性可能发生转换；两种文化与正统、异端的关系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



文化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地位便有正统与异端之分。该书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①

(6) 韩晓莉著《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该书以山西乡村社会影响广泛的秧歌小戏为对象,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百年来民间戏曲的变迁过程进行考察。秧歌小戏作为生发于民间的草根文化, 从兴起之初就得到了来自民众的广泛支持, 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秧歌小戏发展繁荣的动因。20世纪以来, 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过程, 从世纪初开启民智需要的戏曲改良运动, 到根据地时期作为政治动员手段的新秧歌运动; 从共和国成立后“推陈出新”口号下的戏曲改革, 到“文革”时遭受的严厉打压。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开展的社会动员。通过这样的文化改造, 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表现出不断被政治化的趋势。在梳理时代变革下秧歌小戏变迁轨迹的同时, 作者尤其注重揭示文化背后各种“关系”的调整, 如民间戏曲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化, 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博弈融合等。这样的研究思路恰恰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强调的从社会的层面考察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的学术追求。突出文化的能动性, 重视文化与社会互动, 不仅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和内涵, 避免研究的“碎化”, 也为社会史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可以说, 该书正是社会文化史视角下, 从文化整合出发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 进而探寻政治在地方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尝试。

(7) 梁其姿著《从疔风到麻风: 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梁其姿教授的新著《从疔风到麻风: 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向人们呈现了麻风病在中国长时段的历史进程, 将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 用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给一直以来为欧洲经验所左右的现代化叙事提供有益的替代, 从而实现中西学术的对话。“梁著出版后, 迅速引起学界的关注, 凯博文 (Arthur Kleeinman)、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班凯乐 (Carol Benedict)、伯恩斯 (Susan Burns)、许小丽 (Elisabeth Hsu) 等著名学者纷纷为其撰写书评, 并刊登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杂志上。一本疾病社会史著作

^① 参见罗检秋《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一书的“内容简介”与“导论”。

在短时间内就有十余篇来自不同领域的书评是很罕见的，令人不禁将其与十多年前何伟亚《怀柔远人》出版时所引起的轰动相比。但与何著所引起的巨大争议不同的是，梁著却获得了评论人的一致好评，即使个别评论人在某些地方持不同看法，也都基本认同，认为其具有重要价值，是医疗疾病史研究的必读书。……这些在西方学术语境下作出的评论显示，梁著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疾病医疗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力作。”“将该书置于中国的学术背景下，对其中一些内容予以重点介绍和评论，藉此彰显该书的价值、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就如何书写中国的疾病史问题做一探讨。”^①

（8）梁景和主编的《婚姻·家庭·性别研究》。2012年以来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四辑。该丛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录用研究性学术论文的篇幅长短不限，可以发表长篇文章，比如第二辑收录的《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一文，大约有15万字的篇幅；二是以发表20世纪婚姻、家庭、性别问题的学术论文为主，兼及其他历史时期。在已经出版的四辑当中，共收集了20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研究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的，其中一篇是研究21世纪最初12年（2000年至2012年）的婚姻问题。这样的研究具有基础性与开拓性，是为未来的深入研究所做的前期铺垫。用历史学眼光、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进行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丛书的主旨在于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方面做些有益的工作，也可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提供借鉴和启发，鼓励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②

（9）肖永明著《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张天杰曾撰文指出：“一百多年来，关于书院的研究层出不穷，将千年书院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加以总结研究，为书院精神在现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肖永明教授的《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则是书院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的书院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寺庙、道观是佛、道两家的文化符号，

① 杨璐玮、余新忠：《评梁其姿〈从疔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参见梁景和主编《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12、2013、2014。



那么书院就是儒家的文化符号。研究唐宋以来儒学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研究理学绝对离不开书院。……将书院这一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放入社会大系统之中才能真正认识书院。了解书院制度的特色、地位、功能，不能局限于书院制度本身，而要将书院放入社会大背景之中。……能做到对千年以来书院的历史进行立体、宏观的研究，与肖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长处是分不开的。……肖教授的大作将儒学、书院、社会三者结合，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来全方位、立体地透视千年书院，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中把握书院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书院的功能、作用与历史地位，对书院的认识得以更加完整和准确。该书是近年来书院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书院文化最佳读物之一。”^①

(10) 梁景和主编的《社会生活探索》。这套辑刊从2009年以来已经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辑。这里所谓的“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在以生产为前提而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为了维系生命和不断改善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便是狭义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相当丰富的内容，同时亦存在其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两性伦理、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这套辑刊主要是以研究狭义的社会生活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来探索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诸如很多社会生活问题是伦理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的哲学高度去诠释；社会生活的具体样法又是经济的一种反映，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生活又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直接进行社会生活的探索；文学作品是从文学的视阈解释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一点看，它与历史学是相通的；社会生活又反映着社会政治，政治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与教育和心理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所以政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也同样可以用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社会生活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领域。所以这套辑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索社会生活问题。^②

① 张天杰：《千年书院历史的立体透视——读〈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 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0、2012、2013、2014。

（11）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姜进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女性与演艺是20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两个最为活跃和显眼的部分。上海的演艺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所，数以百计的大小剧场影院里，日夜上演着形形色色的人间悲喜剧，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营造着大都市的文化信息。女性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之所以如此，却是因了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个也许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一个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重大历史性变化。”

该书写作的意图在于要“深入展开对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在由女性主义史学、大众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这三种视角和方法交叉构成的总体框架下，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做深入的探讨，着重考察女性对上海通俗演艺市场的介入是如何影响了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女性又是如何通过参与营造这一都市的公众空间而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本书的研究明确揭示出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带有浓厚的移民性、大众性和女性化特征”。通过该书的研究发现，“上海大众文化的女性化特征十分明显。从民国初的女子文明戏，到旦角和女演员先后在越、沪、淮等剧种中成为台柱，再到全女班越剧的兴盛，这些都是中国女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变化的一个突出体现”。总之，上海“女子越剧与摩登女郎的出现、女子文明戏、少女歌舞团，以及抗战时期女性文化的兴盛共同昭示了20世纪中国女性之兴起这一普遍社会现象及其深远的文化意义”^①。

（12）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这套辑刊从2010年以来已经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辑。这套辑刊访谈的内容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普通百姓与基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动。该辑刊名曰“访谈录”而不称“口述史”，反映了编者对近些年来学界对“访谈录”和“口述史”不加区分现象的一个谨慎的态度。编者曾撰文指出：“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一个记录，它可以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可见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

^① 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1~7页。



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访谈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访谈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的印象鲜明。而口述历史虽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和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①该辑刊第一辑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山西省保德县进行的采访;第二部分是围绕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在河北省深泽县进行的采访;第三部分是围绕“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问题进行的采访。第二辑是一本生命史访谈录,是访谈者对十名“文革”前农村大学生所做的个人生活史的访谈。第三辑是围绕1949年至1966年北京地区婚姻文化变革这一主题对各类人群(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军人等)进行的采访。第四辑是围绕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娱乐文化变革这一主题对各类人群进行的采访。这套访谈辑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突显它的史料价值。^②

三 新层面的理论探索

五年来学者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现仅就几篇重要论文做大略介绍。

近年来《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几篇重要的理论文章。《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发表了刘志琴的《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以及梁景和的《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发表了李长莉的《“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刘志琴的文章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探索论文。文章指出,社会文化本身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

① 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 参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12、2013、2014。

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从本土资源中来建构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梁景和的文章作为理论的思考提出要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它既是拓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也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这篇文章对生活质量的观念以及研究生活质量的观念、内容和问题等做了全面的论述和讨论，并特别强调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的旨意是要从一个新的视阈思考社会文化的综合性问题。李长莉的文章在对微观研究、“碎片化”与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论述之后，进一步阐述了“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的问题。这篇文章最后重点论述了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这一主题，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实践这一主旨的学术路径，指出“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

《晋阳学刊》2012年第3期发表了左玉河主持的《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笔谈。其中包括刘志琴的《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左玉河的《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等文章。刘志琴的文章从中国最古老、最神圣、最受尊崇的史学的发展脉络谈起，认为从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发展经历了自身的四大转向，这个转向反映了中国史学自身功能和特征的变迁，即历史学从以神谕为纲到以资政为纲，再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到今天的以生活为纲。刘文认为，“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而社会文化史以生活为中心，“要发掘另一个中国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梁景和的文章是针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后，社会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下对社会文化史发展的一些理论思考，文章是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几对概念的辨析进行论述的。通过这样的论述希望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如对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理解），要认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与主旨（如对生活与观念的研究），要了解社会文